

徽州文书档案与中国新史学

王国键

中文提要: 本文从新史学的角度论证了徽州文书档案对学术研究的重大作用。新史学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对传统史学进行改良的新的史学运动。它主要提倡扩大历史研究领域, 加强民众社会研究, 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 并要求加强历史综合研究, 努力解决历史学的“碎化”问题。徽州文书档案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 伴随着中国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 它的开发和研究, 为中国新史学提供和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 并在众多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徽州文书档案来源于民间, 它的研究有助于新史学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实践和运用。作为综合、典型和连续性材料, 它的开发和研究又能促进徽学的综合研究, 为历史学解决“碎化”问题探索有效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 徽州文书档案新史学

史学的起源虽然存有多种说法, 但历史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至少已具有千年历

史。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 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 传统史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期, 一批历史学家通过反思, 对传统史学中存在的重大弊端提出了改良方法, 举起了新史学大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这些改良方法逐渐在史学研究中付诸实践, 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不懈改造。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 到 20 世纪末期, 新史学已越来越多地被各国史学家认同, 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主流和趋向。徽州文书档案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 伴随着中国新史学的兴起和实践, 它在中国新史学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 以及在新史学新的学术前景和要求下的价值和作用问题, 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

徽州文书档案涉及徽州历史社会诸多领域, 其全面性和系统性为新史学开展民众社会研究, 不断拓展新的学术领域提供了可能, 为中国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史学的出现, 首先是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狭窄, 史学界要求扩大研究领域而兴起的。在 20 世纪以前, 中外史学的研究领域受传统史学影响, 局限于政治史, 政治成为史学研究的唯一领域, 使史学背离了探索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存在和各个领域的初衷, 造成了历史即是政治史的畸形学术, 使史学远离科学, 远离民众和实践。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和科学各种学科的细化和发展, 特别是经济、文化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显重要, 单一的政治史研究, 日益引起各国史学家的不满。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一批史学家在深刻认识历史和史学的同时, 提出了改造传统史学, 扩大史学研究领域, 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和方法。如在法国, 1900 年, 亨利·贝

尔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在发刊词中提出了“综合历史学”的思想。他指出，传统史学以政治事件为唯一内容，缺乏科学性，应当创立一种新型的综合历史学来取代它。¹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在创刊号上，他们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要求把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乃至心理和下意识的领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²

在中国，清末民初，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也以渊博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对传统史学的变革问题进行了思考。如章学诚在系统反思中国史学传统后指出：“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故人所谓‘史学’，则未之闻矣”，³认为传统史学只重视烦琐考据和空言理论，而不能够经世致用。梁启超在1901年刊布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不同之处，认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⁴呼吁“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通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他期待“分途以赴，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⁵

新史学思想的出现，为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而新史学思想在中国付诸实践却走过了一段路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具有新史学特征的研究，是由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等新发现引起的。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史学界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郭沫若、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沈兼士、顾颉刚、朱希祖、徐中舒、董作宾等专心致力于这些新史料的收集、整理、著录、考订和研究。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以新发现的这些新史料为研究对象，以重建中国古史为目标，掀起了以甲骨、简帛以及敦煌藏经洞文书研究为代表的新学问之划时代研究热潮。这些新发现，使史学研究有了更广泛的天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背景和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一些新的史学方法的实践和运用。如王国维曾说“我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⁶

然而，新史学的兴起，最明显的特征是历史研究领域的全面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过去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社会、人口、思想、文化、心理乃至潜意识中的内容，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全面结合。而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给历史学带来的重大方向上的改变，即是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由政权的上层社会转向民众社会，由民众社会而全面扩大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新史学的真正兴起可以说是从民众社会的研究开始的。而中国民众问题的调查虽然兴起于20世纪初期，但史学界的研究却始自20世纪30年代，兴起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

20世纪初，中国许多地区曾开展过大规模的民事商事调查。如徽州地区在宣统元年（1909）就曾进行过社会调查，由徽州知府刘汝骥主持。这次调查形成了详细的历史记录，其中黟县、绩溪、祁门三县形成的民事商事调查报告，被收藏在安徽省档案馆，并被收入刘汝骥的《陶甓公牍》。⁷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和农村社会调查又一次盛行。如徽州地区在1936年又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这次调查所得的徽墨、宣纸、

茶叶等行业的一部分报告，也被收藏在安徽省档案馆。虽然不排除有些史学家也参与了这些调查的可能性，但作为史学问题，史学界引入民众问题研究，则是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1939 年，傅衣凌在福建省西部山区的永安县发现了从明代中叶到清末的 100 多件契约文书，依据这些新发现的契约文书，傅衣凌对明清土地价格、地主佃户关系等社会经济史问题进行了研究。⁸这是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由过去依据正史食货志或实录等制度史研究，转向依据档案契约文书等进行农村经济状况研究的开始。1956 年，邓拓收集研究了北京近郊门头沟煤矿文书档案，⁹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使得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因注重利用新史料而得到关注。为了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者们纷纷搜集运用正史以外的各种史料，对明清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诸多方面展开了讨论。然而，正当中国新史学开始向前发展的时候，随之而来的 20 世纪 60 年代至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历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理论的指导，又使崭露头角的中国新史学夭折。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拨乱反正所带来的思想大解放，

使中国史学界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史学积极吸纳西方先进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在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得到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商业经营、土地关系、赋税徭役、宗族社会、文化教育、政权法制、生态人口、社会关系和民情风俗等领域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单一的政治史研究局面，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根本转变。

在这场转变过程中，徽州文书档案的开发和研究，为中国新史学从单一的政治史研究向民众社会研究的根本性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史学界，最早系统研究徽州文书档案的学者，当推傅衣凌。而傅衣凌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家，对中国新史学的贡献又是与徽州文书档案密不可分的。继 1939 年福建永安县明清契约文书研究之后，1960 年，傅衣凌又依据新发现的徽州佃仆文约，对徽州佃仆制问题进行了研究。¹⁰这使得傅衣凌在利用民间契约文书资料方面始终走在当时中国史学界的前列。¹¹其后，中国史学界主要依据徽州民间契约，并极力搜求各地的契约文书，开展了佃仆制研究的学术大讨论。在拨乱反正不久，1980 年，傅衣凌又开始进行徽州土地契约研究，利用徽州买卖契约对明代前期通货问题进行探讨，¹²推动了明清经济史研究深入徽州农村社会各个领域，依据徽州契约文书和各种民间史料对明清徽州农村社会展开了全面研究。在杨国桢、叶显恩、章有义以及国内外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徽州农村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在佃仆制研究之后，又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为新史学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发挥了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傅衣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开创的徽商研究，又掀起了新的研究高潮，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徽商原始资料的大批公布和研究而逐步走向成熟。如果说傅衣凌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那么，徽州文书档案的新史料作用则功不可没。而徽州文书档案之所以在新史学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它内容涉及徽州社会各个领域，比较全面系统，有助于新史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徽州文书档案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其全面性和系统性。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诸多方面，徽州文书档案都有涉及，其种类之多，所涉范围之广，其它地方史料难以企及。具体来说，徽州文书档案涉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土地关系、政治制度、商业经营、文化、宗族、教育、风俗、人口、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七个世纪的历史缩影。¹³难能可贵的是，徽州文书档案的来源包括徽州一府六县的全部范围。这就使得徽州文书档案不是一个县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录，而是徽州整个地区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在一个府的广大范围内，能够流传下来如此多的完整反映一个地域长期发展历史的文书档案，这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除徽州地区外，徽州文书档案还来源于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内容涉及其它许多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能够反映全国其它地区的一些历史真实面貌。从地域上来说，它在某些专题上又具有全国性。

纵观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末徽州文书档案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研究中的作用和成果，它的开发和研究，确实带动和促进了中国新史学对整个社会领域的全面研究和发展。我们曾统计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末徽学研究论文 866 篇，其中地理和社会历史方面的论文有 39 篇，商业方面的研究论文有 249 篇，宗族、会社、土地关系和赋役制度等方面论文 204 篇，文化、艺术、教育、科举、民情风俗等方面论文 321 篇，社会关系、交通、邮政等方面论文 53 篇。而利用徽州文书档案的研究论文占总数 35.1%。¹⁴在 20 世纪后半期，徽州文书档案的开发利用，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美国学者视其为“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¹⁵日本学者认为它“作为今后明清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史料群备受期待”，¹⁶中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取用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历史文书档案为主要资料，综合研究历史社会实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¹⁷可以说，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凡涉及中国明清农村社会的史学上的任何重大研究，都不能忽视徽州文书档案的存在。徽州文书档案已为经济、社会、文化、民俗、宗教等方面的一些重大历史课题所重视，并为其利用和研究。如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田昌五等总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李文治的《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懈》等大型史学课题，都运用和研究了徽州文书档案。徽州文书档案在史学各个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正如日本学者白井佐知子所说的那样“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工商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化等。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不断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¹⁸

徽州文书档案不仅为新史学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提供了资料，而且其研究在诸多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上还取得了突出成果。比如，在社会史方面，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叶显恩、章有义、彭超、刘和惠、陈柯云等人通过对徽州文书档案的研究，对这一重大问题都有一些论述和看法；在中国传统社会变迁、民间社团的组成与社会关系、区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等重大问题研究上，周绍泉、唐力行、郑力民、赵华富、刘淼、涩谷裕子等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经济史方面，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和货币发展问题，傅衣凌、刘和惠等从契约研究中得出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性和货币经济的不成熟性之结论；在中国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及其分化、整合、转型，农村经济资源的支配、管理和使用问题，地域经济的特点、发展与近代化等问题上，叶显恩、章有义、栾成显、刘和惠等也有一些新的研究。另外，在商业史上的中国商品经济结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商人资本与封建政权、家族商业与私人地主商业、士商一体化等问题的研究上，傅衣凌、叶显恩、张海鹏、王廷元、陈智超等也有不少成果。在法制史上的产权转移法律程序和规定、国法与私约、官府审判与民间自生秩序等问题上，周绍泉、陈柯云、卞利、白井佐知子、中岛乐章等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民俗学上的民间财产继承与诸子均分、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社会转型与大众心态等问题上，栾成显、王振忠、卞利等也利用徽州文书档案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都充分说明，徽州文书档案开发和研究，不仅为中国新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促进了中国史学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

徽州文书档案是民间性和民众性材料，它符合新史学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需要。徽州文书档案研究，实践并推动了新史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除提倡扩大史学研究范围外，新史学在研究方法上提倡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他们主张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应从统治者和精英人物转向普通人民大众，转向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和经历。

自古以来，传统史学都以研究精英人物的行为和活动为主线。司马迁作《史记》，“历帝王之岁月”、“录人臣之行状”。虽然他已开明到能为陈涉和吴广，甚至为盗跖立传，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踪迹在《史记》中仍很少反映。西方史学著作中，从来都是皇帝、国王、将军、贵族充斥其间，平民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19世纪以后，历史学家虽然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兴趣有所增加，但历史研究仍以精英人物为主的现象仍未有根本改变。

20世纪初，以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提出要加强对社会下层民众的集体心理研究，开始为探索普通民众的经历和思想提供新的史学方法。而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就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忽视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轻视劳动群众的研究，这样的历史学不可能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如恩格斯就曾说过：“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存在”，¹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²⁰

在中国，梁启超也指出：“普通人物，多数人的活动，其意味极其深长，有时比伟大人物还重要些，千万不要看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真相，看不出风俗的由来。”²¹

倡导自下而上地研究民众和社会，在中国主张最炽的是毛泽东。早在1926年和1927年，毛泽东即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等地开展了农村调查，写出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等调查报告。1930年，毛泽东提出“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²²并亲自到寻乌、兴国等地农村调查，写出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等报告。²³到了40年代，毛泽东又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要求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和艺术，面向农村面向群众。解放后，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史学对人民群众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

然而，其后不久，在20世纪60、70年代，受政治史为研究主线之影响，普通民众的研究却没有摆脱政治这条路线，民众研究限制在政治史的框架中，被研究重大历史事件探索斗争历史所牵引。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思想心态、宗教信仰等，没有从应有的高度，以应有的态度去对待和重视。在史学界，重精英轻民众，重正史轻民间的现象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存在。这种现象体现在史料运用上，最显著的标志即是有些学者还认为官修正史是史学的基本史料，至于家庭私人档案等材料，则难登史学大雅之堂。这种史学思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有一些残余影响。如1983年，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叶显恩编著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出版，²⁴书中运用了大量来自徽州农村第一线的私家文书档案，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不久，

其独特和新颖的研究方法即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重视，被有些专家认为“这种写法，是断代地方经济史专著写作的一个创新，也是一次较成功的尝试”。²⁵这本书作为系统运用包括徽州文书档案在内的各种史料，综合研究徽州农村历史社会的开山之作，在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之所以能够产生较大影响，正是这本书中较早运用了大量的来自民间、反映民间的契约文书。

当时人们之所以对这种研究方法还不习惯，主要还是受我国史学的所谓“正途”即依据官方史料叙述正史之惯性所带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史料的限制。我国正史官书，仅《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包括存目，即有 1 万多种、17.3 万多卷。现存历史档案，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即藏有 1000 多万件。我国史料不可不谓丰富。然而，其中涉及民间基层平民百姓的却颇为少见。正史官书有人称之为“士大夫的行传”，而历史文书档案中属王室及其中枢机构的又占绝大多数。平民史料少之又少，微乎其微。至于原始的直接反映平民生活的历史档案、文书更是凤毛麟角。徽州文书档案正好填补了其间的空白。

徽州文书档案的又一显著特点，即是其来源的民间性和民众性。从徽州文书档案的来源上看，徽州文书档案是在民间发现的，是从徽州平民家庭中流散出来的，这是它与其它文书档案之显著区别。徽州文书档案中来源于各个民间家庭的文书档案要占绝大多数。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比如现存的徽州赋役、官府等方面的文书档案，都是徽州民间家庭的一些抄本占大多数。不是抄本的，也是当时历史时期保存于宗族、家庭或基层乡村组织的那一部分文书档案。以黄册为例，按形成来源，在徽州，黄册就有保存在州县的正册和保存在里甲的底册或草册。徽州州县官府都设有专门保存黄册等簿籍的架阁库，正常情况下是应该能够保存下来的。但我们目前发现流传下来的徽州黄册，大多是家庭抄本和里甲草册、底册。除黄册外，徽州告示、谕令、诉讼抄本、各种誊录簿等，几乎全是各个家庭和宗族保存下来的。至于文契、账簿、租约等更是徽州民间生活的各种伴生物，都是由徽州民间百姓保存下来的。

从徽州文书档案的内容看，它也是以反映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为主，记载的绝大多数是与平民百姓休戚相关的事情。我们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文书档案为例，对徽州文书档案的内容结构作一分析。下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各类徽州文书档案所占比例统计表：²⁶

种类	数量（件）	所占比例	种类	数量（件）	所占比例
土地关系类	10298	72.8%	教育科举类	57	0.4%
赋役类	1512	10.7%	会社类	150	1.1%
商业类	163	1.2%	社会关系类	233	1.7%

宗族类 982 6.9% 其它 15 0.1%

政治类 727 5.1% —— —— ——

政治类官府文书只占 5.1%，其余的均为与地主、农民、商人有密切联系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反映的领域以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为主。特别是经济文书，总数加起来占 84.7%。因此，有学者一提到徽州文书档案，就认为那只是研究徽州社会经济的新材料。这种认识虽然有些偏颇，但徽州文书档案中反映农村经济的资料占绝大多数却是事实。这在我国历史文书档案中是十分罕见和难得的。徽州文书档案同以往发现的重大文化遗产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以王室官衙类政治史资料为主的局限，表现出了鲜明的民间性和经济特色，十分具体和实用。

形成于民间社会的徽州文书档案，没有泛泛描述，有的只是具体的、微观的记录。例如它对徽州家族的世系递嬗、家族教育、科举状况、土地积累、管理经营、宗祠创建、族产管理和运营、与官府和当地其他家族及农民的关系、商业活动和资产的积累等情况的记载，对徽州百姓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各种会社、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的记录，详细到每家每户，有的具体到每一个人。再如，宗族各式账簿，每天、每月到每年的开支，都有流水账和总账相互对应；宗族祭祀登记，更是细到每个支派和各个家庭支丁；土地管理，有的家庭收藏有每一块土地完整的文书档案，有土地登记和赋税管理的，有税役征派的，有出租收佃和交租谷的等等。如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历史百科全书，徽州文书档案对农村社会的各个历史领域都有涉及。

徽州文书档案中，有许多记载和反映平民生产生活的内容如果在官方文书档案或文献史籍中是不可能记载的。如歙县档案馆保存有一本《古松山舍风雪寒暑墨集》，记载了歙县崔氏平民道光十四年（1834）至咸丰四年（1854）每天生产生活基本情况，除自己每天的开支和活动外，还有一些民间重大活动，如民间教馆、冥寿、续弦、出阁、报讣、药帖、宴席等记录。通过这册文书，我们可以研究既是地主又是商人的崔氏平民日常生产生活轨迹，又可以弄清民间一些重大社会活动的真实情况。再如黄山市档案馆收藏有一册《己亥复教馆记》，记录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民国六年（1917）一位师塾先生的详细收支账目，内有每年学生人数、组成、束脩支付、教馆活动等情况，是研究民间师塾生活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这些有关平民生活的具体记载，正好填补了官方文书档案和正史官书之空白，成为我们具体研究中国农村平民百姓和社会发展实态的宝贵历史资料。

徽州文书档案作为民间性和民众性历史材料，为新史学开展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广阔舞台空间。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不少单位和学者就已十分珍惜和利用这种形成于民间的民众性文书档案。如 1962 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从其收藏的徽州宗祠祭祀账簿所载资料中整理出了 1700～1937 年间的物价、银价统计。²⁷1963 年，苏诚鉴运用徽州租佃契约对鸦片战争前的封建地租剥削问题进行了研究。²⁸方豪于 1971 至 1973 年在《食货月刊复刊》1～3 卷上系统介绍和公布了一批徽商、宗族和民间平民丧葬文书。20 世纪 80 年代后，运用徽州各个家庭产生的档案文书，研究徽州社会和经济史的论文论著更是明显增多。如除前面已提到的叶显恩编著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以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章有义，长期研究明清徽

州大户经济状况，通过对徽州地主、平民档案研究，章有义详细考察了明清徽州的土地关系通例及其变动，于1984年和1988年，分别编著出版了《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和《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²⁹由于依据的是反映历史客观实态的民间第一手材料，书中对明清经济史上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在地权转移的国家干预问题、土地变动频率问题、土地占有形态、地价同租额的关系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与时人研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

除章有义外，在20世纪80、90年代，一大批徽学研究者，以徽州平民文书档案为依据，对明清徽州地主、农民、商人、宗族、佃仆、棚民等进行了集中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状况、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宗法制度、思想文化、民情风俗等重大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栾成显，即利用徽州各式家庭中的平民文书档案，自下而上对黄册制度的基本问题、本质及其衰亡原因、明清大户经济形态、明清农村经济结构等中国社会经济史问题进行了探讨，编著出版了《明代黄册研究》。³⁰由于栾成显依据的是基层的可信的系统文书档案，其中的数据是社会实际的比较全面的客观历史记录，因此才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农村土地分布形态，土地买卖，土地所有与明清农村经济结构，封建国家、地主、农民三者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再如，中国地方商帮的研究，对中国商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原始材料的缺乏，一直困扰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因此，当徽商原始账簿、家书等一经发现后，学术界为之欣喜。这使得中国商业史的研究能够从平民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商业经济的一些问题，避免了粗线条的描述和概论。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王廷元等一批学者利用平民和徽商文书，结合其它史料，对徽商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从微观上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研究，所著《徽商研究》一书，³¹探讨了徽商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有机结合的方法。由于利用了翔实丰富的来源于民间的徽州文书档案，如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档案、胡开文家族分家阄书、徽商账簿、商业合同等等，他们才得以弄清了徽商的资本积累、各种经营活动、资本的出路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从官书正史或社会上层社会中去挖掘研究，则是十分困难的。

三

徽州文书档案是综合性民众原始材料，它符合新史学综合研究方法的需要，能够促进徽学的综合研究，并反过来丰富和发展新史学的研究方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新史学在各国得到广泛实践和发展后，又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历史学的“碎化”现象十分严重。

所谓历史学的“碎化”，是指历史研究过分地细化和分散。随着各种流派的相继产生和发展，史学被分割成越来越细的分支和领域，学科内部的分工越来越明确，界限越来越清晰。这是科学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各门学科的共同现象。然而，“碎化”史学，使得原本具有相互关系的各种领域

变得孤立起来，造成了僵硬的用静止的观点去研究历史。历史研究的专题越来越狭窄，史学著作越来越纠缠于各式各样的细枝末节，对整体的社会演变和人类重大问题缺乏关心。这种“碎化”历史的趋势，不仅降低了史学本身的价值，更使史学越来越孤立于社会大众和社会实践之外。

早在 20 世纪初期，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在年鉴学派成立之始即指出，“历史学要向社会科学开放”的同时，又要“警惕分割成各行其是的一些专门领域，如经济史、思想史等等”。³²但是，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历史学的“碎化”问题才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重视和检讨。1981 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伯纳德·拜林在就职讲演中指出，今后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再是深化以往的专门化研究，而是消化和吸收已经取得的成果，写出“综合性的著作”。³³1981 年，美国历史学家古特曼也呼吁，

目前历史学“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综合，这个综合要包含新史学，同时又要超越新史学”。³⁴针对如何解决“碎化”问题，各国的历史学家纷纷提出一些方法，其中重要的一种方法即是加强民众文化研究。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认为，加强民众文化研究可以为历史学的重新整合提供基础，即使目前还没有可能做到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综合，至少可以使它们逐渐靠拢。美国历史学家本德也认为，“新的综合历史学应当围绕民众文化的形式来写作”。³⁵

徽州文书档案是反映民众社会历史面貌的原始记录，具有显著的民众特征。同时，徽州文书档案所具有的综合性质，使得徽州文书档案能够加强徽学的综合研究，为新史学通过民众社会和民众文化研究，从而解决历史学的“碎化”问题，探讨有效途径和方法。

徽州文书档案不是一种专题性断代性资料，而是一种综合性历史资料。在总体上进行归纳，它可以综合反映徽州的各个家庭、徽州社会乃至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面貌。

首先，徽州文书档案具有很强的归户性。归户性概念是刘伯山在 2000 年国际徽学研讨会上最早提出来的，³⁶笔者觉得很有道理。但笔者认为应正确认识这种归户性。户，应指的是人户或单位，而不同于家庭。这一归户性，应包括归家、归族、归会、归社等等。从来源上看，徽州文书档案是从民间一户户民宅中流传出来的，有的是一户人家形成和保存的关于本户的文书，有的是保存在人户中关于一个宗族、一个会社的资料。因此，反过来说，徽州文书档案最后都能综合或归纳成一个人户的资料，反映一个人户的综合历史发展。例如，安徽省档案馆保存的从明代中期一直延伸到民国后期长达 400 多年的 110 多件档案，最后整理综合均是休宁县二十都三图三甲程达户形成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收藏的 35 件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至民国八年（1919）前后长达 400 多年的文书均是祁门南乡十三都康氏宗族的文书。³⁷黄山市档案馆在 2001 年 5 月征集的 3000 多件文书档案，最后整理综合都能归入歙县富溪汪氏、祁门江氏和婺源曹氏宗族之中。徽州文书档案的归户性，是其具有综合性、可研究性和无穷魅力之所在。

其次，徽州文书档案虽然绝大多数形成于徽州，但它并不只是徽州资料，也不只限于反映和研究徽州，它是中国晚期封建农村社会平民档案中的典型资料。徽州文书档案所反映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生活形态、人际关系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传统的典型体现和反映。

徽州是封建王朝统治政策贯彻十分彻底最为典型的地区，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徽州的历史积淀很深，因此，徽州文书档案所反映的内容在中国农村历史社会中也最为传统和典型。比如，徽州遗存的赋役文书档案，如亲供册、黄册、编审册、实征底册、易知由单、串票、滚单、完纳钱粮执照等，典型地反映了明清赋税制度。徽州宗族遗留下来的各种誊录簿、祠簿、租税簿等资料，记录了徽州大大小小宗族各种活动的原始情况，在许多方面与华南、华北地区的宗族有很大的共同性。徽商文书档案，更是中国传统商帮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典型反映。如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档案，形成于嘉庆至清末这段时期，其时正是徽州茶商由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商业由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它所反映的商业资本形式、经营方式、利润分配和消费以及其衰落的原因等，是中国这一时期传统商业的典型缩影和反映。

徽州文书档案不仅仅是徽州本土的文书档案，它还包括与徽州有关的来源于全国其它地方的一些文书档案，能够反映全国其它地区文书档案的一些面貌。在地域性上亦具代表性。比如，歙县档案馆保存的 100 多封清代徽商书信，是徽籍人士在外经商期间写给徽州故里的家信。其中的徽商有的是替人帮工的小伙计，有的是中层管理人员，有的是经理，有的是独资或合资经营的“坐贾”或“行商”。所涉地区有扬州、泰安、杭州、苏州等 10 多个地方，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主要商业地区、主要商业活动和经营的一些历史情况。

徽州历史社会十分复杂，古代徽州是经济和文化各种类型、各种形态的混合体，因此，记载徽州历史实态的徽州文书档案，在内容上也具备了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条件，在反映各种农村社会实态上具有典型性。比如，中国农村地主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将其分为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公共地主又分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³⁸其所说的各种公共地主形态，徽州文书档案的记载和反映与其调查的情况十分相似，并且记录得更为具体详细。在地主阶层上，徽州文书档案中也对缙绅地主、庶民地主、商人地主有详细记载。比如明代祁门善和程氏，就是一户在明代出过 5 个进士的缙绅地主。这户地主各种族规家法、抄契簿、宗祠祭祀簿、各种会簿、租佃契约和诉讼案卷，为我们研究缙绅地主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依据。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里长户朱学源户，则是徽州典型的庶民地主。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有关该户的万历九年（1581）到康熙四十年（1701）长达 120 年的亲供册、黄册底、户册底、编审册等文书档案，共 2470 页，约 80 万字，是我们研究庶民地主的典型材料。³⁹丰富的歙县西溪南吴氏和休宁率口程氏文书档案，则是研究商人地主及缙绅兼商人地主的典型材料。⁴⁰

第三，徽州文书档案还具有连续性。所谓连续性，是指现存的徽州文书档案在历史年代上的长期性和连续不断。现已收藏的徽州文书档案，若论抄件，最早年代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保大三年（945）谕祭抄件。若论原件，最早年代是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家祭龙简，最晚年代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时间连续跨度达千年，这在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地方历史文书档案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殷墟甲骨近 500 年，居延汉简 300 多年，敦煌文书近 600 年，内阁大库档案等明清文书档案 500 多年。如以时间连续跨度而言，徽州文书档案连续时间最长。

因此，从特点上看，徽州文书档案的归户性，决定其对综合研究徽州民众社会和民众文化具有重大作用；所具有的典型性，又使这种综合研究上升到中国传统民众社会和民众文化研究；连续性更决定了这种综合研究是对不同时期长时段历史实态的研究。徽州文书档案不仅具有综合研究徽州民众社会和民众文化的作用，而且它作为徽州这一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历史记录，对中国农村民众社会和民众文化的长期传承研究也具有重大作用，并能为现今的一些社会实际问题的反思和研究提供帮助，这又符合新史学关于“历史时间的长时段”和历史具有“无限的连续性”理论，以及历史研究要有诚鉴和为现实服务的要求。

那么，徽州文书档案如何在新史学的综合研究中发挥作用呢？笔者认为，应充分利用徽州文书档案的综合特点，加强徽州文书档案和徽州文化的综合研究，在方法论上做出有益探索，为新史学研究方法变革做出先行实践。

我们知道，徽州文书档案中的绝大多数是从民间一户户人中流传出来的。按其来源，现存世的 30 多万件徽州文书档案，其本来面貌，是能够反映徽州上百户、上千户甚至是上万户单个家庭的综合历史实态的。这些家庭作为徽州历史社会的基本元素，构成以宗族、徽商、会社等为基础的徽州民间历史社会。按徽州文书档案本来面貌去研究，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认识和了解徽州这上千上万户家庭的历史基本情况，包括其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教育的各方面综合情况，进而上升到对徽州整个历史社会的综合认识。从历史上的自然形成来看，徽州文书档案正是徽州历史社会的“碎片”。从徽州文书档案形成的本来途径去研究或追述徽州历史社会，比其它任何途径和方法都要全面真实可靠。它使我们综合、贴近徽州历史社会，准确认识中国历史农村社会的种种努力和企盼，成为可能。

现流传于世的徽州文书档案，其存在有两种形式：一是仍按其自然历史形成，即按原始单个家庭为基本独立单位而集中存在的。现散存在社会上的至少 10 万多件的徽州文书档案，就是按这种历史自然面貌而存在，也就是仍按一户户的自然形态而遗存于徽州各家庭。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刘伯山在徽州民间收集的现收藏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的 1.1 万多件文书档案，即都是以归户形式存在的。黄山市档案馆在 2001 年上半年收藏的 3000 多件宗族文书也是以归户形式存在的。因此，徽州文书档案中的三分之一仍具有由生具来的归户性质，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收集并按这部分综合资料的原始面貌去进行研究，对徽学和新史学的综合研究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二是分散存在，归户性已遭破坏。这主要是由于徽州文书档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现以后的分散出售和整理所造成的。这约有 20 多万件。这三分之二的文书档案，自然联系已被割断，因此，对这部分文书档案进行整合，让其回归原来面貌，重归每家每户，再从每家每户去整合徽州历史社会，是徽学在新史学新潮流下进行整体和综合研究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21 世纪，徽学实现综合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即是对徽州文书档案进行内容整合，实现徽州文书档案的归户综合从而到徽州社会的整体综合，为新史学的综合研究提供蓝本和个案。

在新史学提倡综合研究的新的学术背景之下，上述两类徽州文书档案的整合和研究，已不再是简单的整理和研究。它既要有微观整理和研究，又要有宏观研究和综合；既要有各专业领域的分工协作，又要有无学科性质的总体整合。它已突破了单纯的文书学、档案学、史料学或历史学等单个

学科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是运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徽州文书档案的整合为一条主线，对徽州历史社会进行有血有肉的整体综合和还原。而且，这种整合和还原还不仅仅是“小徽州”即徽州本土的还原，由于徽州文书档案内容涉及全国各地，它还涉及“大徽州”即徽籍人士活跃地区的历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的一种历史追述和整合。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整合它们，但我们至少能够通过这种综合方法，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的整体做出大致的轮廓性研究，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总体性和本质性问题的认识。因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的意义已超出了徽学本身，对新史学具有先导性和启迪性重要作用。

徽州文书档案的这种整合，还可以带动和推进徽州文化的总体整合和研究。历史的综合研究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它需要各种基础和条件。在综合研究中，不仅需要能够支撑起整体研究框架而确保不失历史实态的主轴线，还需要围绕这一主轴线的各种基本综合素材。只有在两者兼备的条件下，对历史社会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如果说徽州文书档案是徽州历史社会综合研究的那条主轴线的话，包含各种徽州历史文明存在的徽州文化则是这种综合研究的基本素材，而这些基本素材的获得则离不开徽州文化研究。只有研究徽州文化，我们才能看得懂徽州文书档案，才能将业已分散的徽州文书档案通过整合回归每家每户。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只有深入全面地研究徽州文化，才能弄清徽州历史社会背景，才能弄清徽州的内在和精髓，才能在宏观上把握和指导这种徽州的综合研究。这种综合研究也才能上升到有血有肉的徽州实际社会，才能将“小徽州”和“大徽州”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上升到对中国历史农村社会的整体研究和认识。

（作者单位：安徽省档案馆）

The Copy Files of Huizhou and Chinese New-Historiography

Wang Guojian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new- historiography, this article proves that the copy files of Huizhou have a great effect on academic research. The new-historiography is a new reform movement to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hich appeared betwee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rose after World War Two. It mainly advocated expanding the research scope of history,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the common people's society, studying history from top to bottom, enforcing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n history and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solve the "break-to-pieces" problem of new-historiography. The copy files of Huizhou was discovered in the 1950's. Accompanied by Chinese new-historiography's rising and developing, the exploiting and studying of these files have opened up a new academic realm, and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 in many fields. Since copy files of Huizhou originated from the folk, the study on it can contribute to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new-historiography's research methods from bottom to top. As comprehensive, typical and continuous materials, the development and study of these files can also accelerate "Science about Huizhou" to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which may probe an effective way for historiography solving the “break –to-pieces” problem.

- ¹ 参见杨豫、胡成译著：《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8 页。
- ² 参见杨豫、胡成译著：《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8 页。
- ³ 《文集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 ⁴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初载 1901 年 9 月 3 日、13 日《清议报》第九〇、九一册，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 ⁵ 梁启超：《史之改造》，载《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 页。
- ⁶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 ⁷ 关于《陶甓公牒》及这次调查情况，详见王振忠：《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陶甓公牒〉之民俗文化解读》，载《徽学》2000 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7 页。
- ⁸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94 年福建协和大学印行。详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 ⁹ 邓拓：《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载《历史研究》1956 年第 10 期。
- ¹⁰ 傅衣凌：《明清徽州庄仆文约辑存》，载《文物参考资料》1960 年第 3 期。
- ¹¹ 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载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6 页。
- ¹²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3 期。
- ¹³ 严桂夫、王国键：《徽州文书档案，七个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载《安徽档案》2000 年第 4 期。
- ¹⁴ 详见严桂夫、王国键：《徽州文书档案》，《徽州文化全书》第十四卷，安徽人民出版社待印稿。
- ¹⁵ 约瑟夫·麦克德漠特：《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卞利中译文载《徽学通讯》1991 年第十期。
- ¹⁶ 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载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8 页。
- ¹⁷ 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载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代序》，黄山书社 2000 年版，第 13 页。
- ¹⁸ 白井佐知子：《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载森正夫等编著：《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 1997 年版，第 528 页。
- ¹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集第 315 页。
- ²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集第 104 页。
- ²¹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载《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0 页。
- ²² 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 页。
- ²³ 详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²⁴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 ²⁵ 傅衣凌、杨国桢：《喜读叶显恩新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 ²⁶ 按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中的目录统计，黄山书社 2000 年版。
- ²⁷ 严中平：《关于抓紧收集徽州地区发现的档案文书给中央档案馆负责同志的信函》。安徽省档案馆藏，档号 18.1.47.79。
- ²⁸ 苏诚鉴：《从一批租佃契约看鸦片战争前徽州地区封建地租剥削》，载《安徽日报》1963 年 2 月 9 日。
- ²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和 1988 年出版。
- ³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 ³¹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 ³²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264 页。参见杨豫、胡成译著：《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6 页。
- ³³ 拜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评论》第八十七卷（1982 年）第 3 页。参见杨豫、胡成译著：《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6 页。
- ³⁴ 古特曼：《失去的综合》，《民族》1981 年 11 月 21 日。参见杨豫、胡成译著：《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2 页。
- ³⁵ 参见杨豫、胡成译著：《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6 页。
- ³⁶ 见刘伯山：《“伯山书屋”藏徽州文书简介》，2000 年国际徽学研讨会交流论文。
- ³⁷ 见刘伯山：《“伯山书屋”一期所藏徽州文书的分类与初步研究（上）》，载《徽学》2000 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4 页。

-
- ³⁸ 毛泽东：《寻乌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6 页。
- ³⁹ 见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6～398 页。
- ⁴⁰ 见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载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代序》，黄山书社 2000 年版，第 9 页。